

特集「移動と記憶の日中比較研究」

地盤、迁徙与历史记忆：
藏彝走廊两种社会型态分析
Territory, migration and Historical Memory:
An Analysis of Two Types of Societies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王明珂 (WANG, Ming Ke)

国立中興大学特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長

摘要

本文说明青藏高原东缘藏彝走廊上的羌族、藏族与彝族分别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类型。羌族、藏族属于“山神社会”类型；其特色为注重自身与他群的地盘边界，不轻易搬迁，社会认同重地缘关系，家族历史记忆浅短。彝族则是“英雄祖先社会”类型；较不在意自身与他人的地盘，常搬迁以寻求新栖地，注重家支血缘关系，有丰富的家支历史记忆，因此常赖家支力量外向式地解决资源匮乏问题。最后本文也指出，由“山神社会”到“英雄祖先社会”可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向。

关键词：羌族、藏族、彝族、历史记忆、山神社会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the Qiang, the Tibetans, and the Yi, living along the eastern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types of societies. The Qiang's and Tibetans' social type can be labeled as “mountain deities society”, featured by their insistence on territories and related boundaries of self and others, unwilling to move, territory-based social identity, and shallow family genealogical memory. The Yi, on the other hand, are “heroic ancestor society”, featured by do not insist living in one place and always willing to move to a new habitat, consanguinity-based social identity, and abundant genealogical memory.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developing from “mountain deity society” toward “heroic ancestor society” might be a common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human society.

Keywords: the Qiang, the Tibetans, the Yi, historical memory, mountain deity society

一、前言

在中国西部有一被称为‘藏彝走廊’的地带，跨越四川西部、云南西部与部分藏东地区。此地带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六条大江自北南流；大江及其支流将本地切割成一个个的高山、峡谷、河谷平原与高原草地。这些大江被认为是古人类的自然通道，在此地域上最大的族群为藏族与彝族，或语言学上的藏语支和彝语支人群，因此它得到藏彝走廊之名。在更广大的地理空间上，藏彝走廊是青藏高原东缘高山纵谷地带的南段。整个青藏高原东缘，除了南边的藏彝走廊外，还包括其北方的青海东部与甘肃南部。

过去十五年中，我曾多次在这一地区四川西部进行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研究对象先是岷江上游的羌族，然后是邻近的大渡河流域嘉绒藏族，近两年开始进行对四川南部凉山彝族的研究。我的研究主题，最初是羌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而这两者都奠基于本地村寨人群的社会与经济生态上。在近年来的嘉绒藏族研究中，当地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认同、文化表征是我的研究焦点。

在羌族田野研究中，我注意到羌族由家庭、家门（家族）到本村寨的人、一条沟的人等等一层层的“族群”认同，与相关的历史记忆、山神崇拜之间的关系。这研究让我体认，山神崇拜以及“弟兄祖先历史心性”¹ 是本地人类生态下的重要文化结构——前者产生各村寨人群的祭山神活动，后者则不断让人们忆起及述说本土族群“历史”，一种“弟兄祖先故事”，两者都强化本地人群间合作、区分与对抗的人类生态体系。2005以来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大渡河流域的嘉绒藏族，近三年又及于更广大的“藏彝走廊”上的藏族与彝族；我的研究主题皆在于本地各族群的人、社会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而山神信仰是观察分析的主要对象。

在研究过程中，我体认到彝族是检验以上我们对山神信仰之认识的一个关键。若我们对山神信仰与本地人类生态之关系的理解不误，那么，在藏彝走廊南端，经常迁徙、四处开荒扩张地盘的彝族是否应无类似的山神信仰？在川南凉山地区做了些彝族田野考察后，我得到的初步答案是，的确，一般来说彝族并无藏、羌族的山神信仰；相对的，彝族的家族血缘历史记忆十分丰富。然而这研究的意义不只在于证实山神崇拜的功能，而是在于比较彝族与藏、羌族两种社会后，我们对人类解决生存资源竞争的策略，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以及强化种种群体认同的血缘与空间记忆，均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松潘埃溪沟羌族的山神信仰与历史记忆

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四川西部至云南西北的弧形地域，是一由高原向平原过渡的高山河谷地区。这整个长弧形地域上，满布着5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绝顶与冰川，有森林、溪谷、河谷盆地与高地草原。多元复杂的地理环境，蕴育着世界最丰富多样的植物、动物物种与矿物、地质样本。在本地住民的族群认同、语言、文化等方面也有同样的多元化现象。我们不能为藏族、羌族等民族类别划分所欺，事实上在这儿，所谓藏族、羌族包含许多语言、文化有相当差异的地方族群

¹ 我以“弟兄祖先历史心性”指一种产生模式化族群历史记忆的文化心性，在此种历史心性下，人们所记得及述说的本族群历史，永远始于最早来此的几个弟兄。关于此论点，请参考我的以下著作：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第七章。

，他们在 1960 年代民族识别前并没有明确的藏族、羌族认同，或根本没听过藏、羌这些汉语族名。本地人类群体间的多元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地理上山岳、溪河的隔离作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由于资源匮乏而人群间资源竞争激烈，各地人群彼此划分疆界，并维持彼此之隔离与区分。以下我先以岷江上游的埃溪沟羌族为例，说明山神崇拜与本地人类生态之间的关系。然后我略提及青藏高原其它地区山神崇拜的几个案例，以及此种社会的共同特色。

岷江上游由松潘到汶川，沿着岷江及其支流的两岸山上主要居住的是羌族。本地藏族则分布在羌族之西及北边。这是青藏高原东缘广大康藏（the Kham）的一部分。1950 年代以前，这儿的山区每一小地域人群——如一个山沟中几十户的村寨居民——都认为自身为“尔玛”（本地人的意思），并认为上游的人群都是“蛮子”，下游人群都是“汉人”。一条山沟中的“尔玛”，居住在沿着山沟两侧的几个高山村落中，村落各自占居山沟的一部分（如前段、中段或后段）。每一村落又由几个寨子构成，较大的寨子内部又分成几个小寨子。

一般来说，村寨民众认为同寨或同村的人也是祭同一山神的人群。以松潘热务河流域（小姓）之埃溪沟为例²。这个沟中只有一个村子，便是埃溪村。埃溪村有三个寨子，一队、二队、三队³，共约 50 多户人。一队与二队同在阴山面，聚落相近；三队在阳山面，与前二者隔着山沟。一队的人自称是“背基”人，二队的人自称“北哈”人，三队的人自称“洁沙”人。三个寨子的人，对外都自称是“美兹不”人，以汉话来说就是埃溪村人。然而，寨子中还有更小的人群聚落；寨中同家族的几户人家在居住空间上较接近，形成一个个的居住圈，如寨中之小寨子。如二队是由“北哈”与“梁嘎”两人群单位构成。梁嘎约只有 5 户人，这是二队的上寨。“北哈”中又分成木佳、措河、戈巴戈、罗窝等小聚落，每一小聚落只有 2-6 户人家。

各个寨中都有几个“家族”，然而这样的“家族”又与地缘人群关系密切，而不一定与血缘人群有关。我对此作些说明。同一家族的成员，也是共祭一家族神的人群，而这样的“家族神”又与地盘有关。也就是说，一个沟或沟中一个村寨群，都依地盘而有几个“家族神”。因此，搬到邻近村落去的家庭，进入另一家族神的地盘，便要开始祭当地的家庭神（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祭原家族的神），如此也成为该家族的人。在埃溪沟，这样的家族神称“格母西”。如上述二队“北哈”中的木佳（地盘名），有两个地盘神，“察阿德格母西”与“查姑绩格母西”。一队有一地盘名为“阿尔集母”，其地盘神则名为“阿尔集母格母切”，一个该家族的老人告诉我，他与他的兄弟都属于此“阿尔集母格母切”家族，但他的两个儿子因迁到上面的地盘，于是便成为另一家族的人了。

在过去的传统生活中，沟中垂直分布的资源——半山腰可种粮的缓坡、山上的森林、山头上的草场——供应沟中民众基本生活所需。他们农牧兼营并从事其它副业。在山顶上放牧旄牛及马，在林中捡菌菇及柴，在坡上种各种作物，农闲时到外地打工或做点小买卖。如此，在沟中极有限、贫乏的自然资源下，日常生活中三个寨子的人群，以及寨子内更小的地域人群，都各有地盘。一家人能够在何处种地，在何处挖药、捡菌子、砍柴，在何处放牧，都有严格规定，不能随便越界。

² 以下羌族民族志数据皆为我在 1995-2003 年之间进行的羌族田野研究中搜集；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北京：中华书局，2008）。

³ 一队、二队这称法，是本地人以汉话（四川话）并沿用“大集体时期”（人民公社时期）的名称。以本地话来说，这三个寨子的名称便是背基、北哈、洁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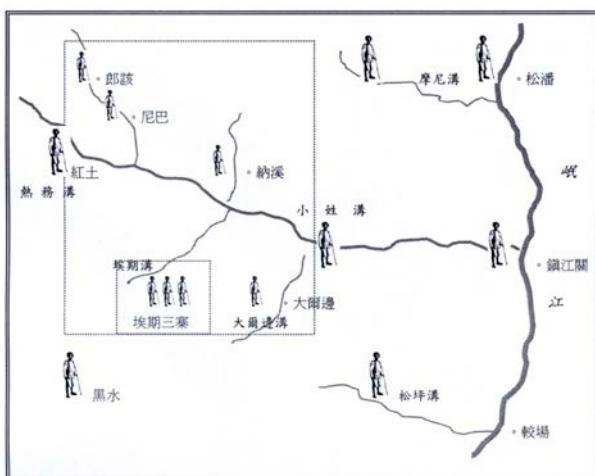
对村民来说，这些传统的人群地界区分是根深柢固的。山神信仰，以及本土流行的一种“历史”，也强化这样的人群资源区分。以山神信仰来说，譬如，二队中的“梁嘎”五家人自己有一个山神，二队的“北哈”也有自己的山神。由于“北哈”与一队关系密切，所以一队也祭这个山神。同样的，一队与三队自有其山神。所有埃溪沟三个队（寨子），共同祭一个更大的山神“格日囊措”。在更大范围内，“雪宝顶”菩萨（藏传佛教与山神的混合）信仰，则是埃溪沟与松潘附近各沟羌、藏族民众共同祭拜的山神。



（谢山神）。

若我们问起本地人的来源，埃溪沟居民会提及一个“历史”。这历史称，最早这儿没有人，三个弟兄来这儿来。大哥是一个跛子，所以他住在阳山面，成为三队的祖先。老二与老三来到阴山面定居，他们分别是二队和一队人的祖先。二队人的说法又称，当时么弟有些怕，二哥就说，那你死了就埋到我二队来。这个“历史”，说明埃溪三寨人有合作、区分又对抗的关系。埃溪沟人又说一个“七兄弟故

事”，以此“历史”说明包括埃溪三寨（其中三个兄弟的后代）在内的整个小姓沟（包括大尔边沟、埃溪沟、热务沟）各村寨人群的由来。我从一本地老人口中听得另一个“七兄弟祖先历史”；此七弟兄的后代包括今日茂县、松潘、黑水等地各沟村寨人群，其中有藏族也有羌族，他们是共同祭拜本地最大山神（神山）雪宝顶（都如）的人群。



（图中三层方框及其内的人形，代表埃溪沟三种“弟兄祖先历史”所指涉的空间范围及人群）

以上三种埃溪沟人说的各个人群的“历史”，虽人群范围大小有别，但这些“历史”的结构类似，都是说几个居处相近的村寨人群为最早来此的一组弟兄的后代。有类似结构的“历史”在岷江上游村寨中非常普遍。我在过去的著作中曾说明，这是与本地人类生态密切相关的一种历史记忆文化结构

，我称此种文化结构为“弟兄祖先历史性”。

另一个羌族的例子。在较汉化的汶川县的绵篪，本地有五个村，其中三个关系较密切的村（或较老的村寨）是理平、簇头、沟头。簇头村拜的是川主庙，沟头村拜的是魁星庙，理平村拜的是乩仙庙。簇头与沟头村在同一匹山上，他们有共同的山神，称“不住什”；理平和另一村“高东山”在同一匹山上，所以他们也共同敬一个山神，“关都什”。虽然几个村有共同山神，如簇头、沟头祭同样的山神，但祭山的时间不同，如此也表现各村寨间的区分。另外，本地有禹王庙，又有雪龙包山，这是所有村寨民众共同祭拜的。在人群的共同起源记忆上，簇头村有一老传说：过去有八弟兄来此，建立八个老寨子，目前只剩下理平、簇头、沟头三个寨子。这个弟兄祖先故事，与前述小姓沟埃溪村的弟兄祖先故事相同，解释“寨子”与寨中之人的共同来源，以及他们间的区分⁴。

三、川西藏族的山神信仰与历史记忆

在整个川西羌、藏族地区，这样的山神信仰与弟兄祖先故事也非常普遍。只是因受汉化或藏化影响及其程度不同，每个地方的山神信仰都有些差异。

小姓沟东边，有平武县的虎牙藏族与色尔藏族，与小姓沟隔着雪宝顶山。虎牙藏族也称山神为“尼萨”。据调查研究者曾维益称，整个色尔藏族共同的神山有四：最大的山神为“独日”（都如），也就是雪宝顶山神，其次是女山神“阿确旭日”，第三是“莫扼莫支”（照面山），第四是“洛武言吕”。另外，每一地区、每一寨都有其山神，如大寨的山神是“莫扼莫支”（照面山），如高山堡寨的“敖古彻斗”等等⁵。色尔藏族也有类似的山神信仰体系。色尔藏族共同崇拜境内的七座大神山；其中又有三座分别是热宜、色尔、俄洛居三个主要寨子的山神。在更上层，色尔藏族又崇拜雪宝顶山神“独日”（都如），以及西藏大山神“玛切波喜玛拉雅”、“学且切玛日”（北方大山神），“好确旭玛日”（西方大山神）。在七大神山之下，又有各寨的山神。在祭山神时，依序先请“独日”（都如），再请“玛切波喜玛拉雅”、北方大山神“学且切玛日”、西方大山神“好确旭玛日”，然后请本地七大神山，而后再请本寨山神及周遭的各寨山神⁶。

岷江上游的左邻大渡河上游地区，主要是嘉绒藏族所居之地。丹巴县的巴底乡各村为嘉绒藏族的最南方村落。巴底各藏族村落也有山神信仰。一般是一个村（寨）的人共祭一个山神，也有几家共祭一个山神的情况，与羌族地区类似。如巴底的莫尔落村，该村共有约30户人家，过去寨子上方称“武甲”的地方还有约10户，现在已无人住。据老人们说，过去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地盘，砍柴、打猎、放牛都不能越界。山神称“巴些”。每个村寨的后方山上都有“巴些”，一个村一个。同一村与主聚落分离而自成小聚落的几户（通常称小寨子），也有自己的一个“巴些”。如前述莫尔落村的“武甲”，便有自己的山神。又如，邻近的色足寨，河西（大渡河右岸）30多户一个巴些，河东（大渡河左岸）10多户一个巴些，另外河东还有两个小寨子“些端”与“嘎洛”，各有自己的巴些。山神（巴些）的标志是山梁上的石堆。基本上村寨的地盘依巴些的位置来分：以山为界、以沟为界。在山梁上一排排的

⁴ 以上关于埃溪沟（埃期沟）之田野考察资料及分析，见本人著作《羌在汉藏之间》，

⁵ 曾维益，《虎牙藏族》（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93），页140-143。

⁶ 曾维益，《色尔藏族》（四川省格萨尔办公室，1997），页376-379。

“巴些”，标示着各村人群的地盘范围，及各村寨在其地盘上使用山林的权力。

在各村自己的山神外，有更上一层的山神。巴底人传说的一个故事，称有一个会飞的喇嘛，别如杂尼，飞到五个山上。首先是康定跑马山，再来是巴旺木旭山（布依），再到巴底莫尔洛山（当玛）、巴底木乃山（韩家坝后面山上），最后飞到敖波山（齐鲁村对面山上）。这个说法反映巴底、巴旺各村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过去他们与康定间的密切关系。但康定究竟太远，所以一般祭山神不会祭康定的山神。祭山神时，除了自己村落的山神外，要将附近的大小山神的名字都念到。所以，他们会先念墨尔洛神山，然后念次一等级的大山神，最后念到本村寨的山神及邻近各寨的山神。

另外，每一村内都有许多小地域，各有地名；如莫尔落村有尔色尼约、博恰、江木括、江木博、博尔不、聂如各木等。每块地域上又有几个房屋的地盘，各有其地盘神。地盘神的名字就是该房的房名；房名与地相联，不会改动。莫尔落村三十多户，因此有三十多个房名（本地人以汉话或称之为家族名）。过去每房都要给土司上税。一家人兄弟分家后，离家的弟兄先带着原来的房名，但又用迁居地地盘的新房名，后来老房名就被忘了。

在我从事田野考察的巴底乡各藏族村，人们对于“本地人是咱个来的”这类“历史”问题经常难以回答。他们记得的“家族”历史通常很短，一般约只有两、三代，而且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又经常有不同“房名”；房名代表另一种以空间关系为主的“家族”体系。造成这现象的原因，便如上述，因迁居或上门而住到别人的地盘上，就要开始用迁居地地盘的新房名。这情况与埃溪沟羌族十分相似。他们爱谈的“过去”是土司家族来源的“历史”，和从前土司间的婚姻与战争的事，以及山神菩萨间的神话故事。羌族地区盛行的“弟兄祖先故事”在本地很少听过，但它常出现在本地土司的家族历史叙事中。如以下这两则嘉绒土司家族史：

远古之世，天下有人民而无土。天上降一虹，落于奥尔卯隆仁地方。虹内出一星，直射于壤戎。其地有一仙女名喀木如芈，感星光而孕。后生三卵，飞至琼部山上，各生一子。一卵之子，腹上有文……。此子年长，东行，依腹文觅地，遂至绰斯甲为王……。绰斯甲王者，三卵中花卵所出之子也。其余二卵：一白一黄，各出一子，留琼部为上下土司。绰斯甲王出三子：长曰绰斯甲，为绰斯甲之土司；次曰旺甲，为沃日之土司；三曰葛许甲为革什咱之土司。

荒古之世，有巨鸟，曰“琼”者降生于琼部。琼部之得名由于此，译言则“琼鸟之族”也。生五卵：一红、一绿、一白、一黑、一花。花卵出一人，熊首人身，衍生子孙，迁与泰宁（八美），旋又移迁巴底。后生兄弟二人，分辖巴底、巴旺二司⁷。

前一家族“历史”解释绰斯甲土司以及沃日土司、革什咱土司的祖先来源。后一“历史”解释巴底土司与巴旺土司的祖先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历史”的下层都有弟兄祖先历史之结构。

四、青藏高原东缘南段的凉山彝族社会

彝族是检验我们对山神信仰之认识的一个关键。若我们对山神信仰与本地人类生态之关系的理解不误，那么，过去（1950年代以前）在青藏高原东缘南段经常迁徙、四处开荒扩张地盘的彝族是否有

⁷ 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见《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页135、140。

类似的山神信仰？2009-2012我在川南凉山彝族地区进行几次简单的田野考察后，我得到的初步答案是，一般来说彝族并无类似藏、羌族的山神信仰。相对的，彝族的家族血缘与英雄历史记忆十分丰富。我们先从彝族社会的人类生态说起。

川西南的凉山地区在青藏高原东缘南段，地接云贵高原，因此在自然环境上它居于两者之间。多高山的环境同青藏高原东缘的藏羌地区，但凉山地区有宽广的山间盆地，这一点略同于云贵高原。在传统经济生活上，本地彝族农牧兼营，且从事多种副业以补不足，这些都与羌、藏族十分类似。

彝族与羌、藏族最大的差别是在其社会结构上。彝族社会是阶序化社会，其内部有“诺伙”、“曲诺”、“阿加”、“呷西”等四种类似印度“种姓”的社会阶级人群。诺伙俗称“黑彝”，人数虽少却是贵族与统治者。曲诺俗称“白彝”，为前者的百姓，人口约占彝族总人口的半数。他们隶属黑彝主人，有部份财产权与人身自由，此视主人及地区而异。阿加，一般以汉语称“安家娃子”，他们是为黑彝或白彝主人从事农作生产或家务工作的奴仆。呷西是单身家奴，也从事农务与家务，但因无家室，所以成为全时间服事主人的最低层奴仆。黑彝与白彝绝不通婚，与其它阶层人群的婚配就更不允许了。

黑彝与白彝都有其所属家支（如家族），靠着家支历史记忆而有很强的内聚力；此方面黑彝家支的凝聚力与动员力又远胜于白彝家支。与藏、羌族固守本村寨地盘的习俗不同，彝族经常迁徙。搬迁的理由很多，家支与家支间打冤家被打败而迁，或因家支内不合而迁，或因本地生产条件不好而靠家支关系迁于外地，或与外地家支结亲而迁。家支迁徙的缘由、过程是重要的社会记忆；每一家都说得出祖先的迁移历史及所经地名。他们迁入的地方，绝大多数是有本家支或姻亲家支居住的地方，也有往汉、藏、纳西住地边缘开荒的情形。迁走后，留下的地方很快有其它家户迁入。以历史趋势来说，近百年来凉山彝族各家支往西、西南、西北迁徙的很多，因此整体彝族的栖地空间范围有相当扩张。邻近凉山彝族的藏族与纳西族传统领域都有彝族迁入。因此藏族与纳西族对凉山彝族的观感是，他们野蛮、不尊重别人的地盘。打猎的习惯也一样，通常凉山彝族狩猎的范围比藏族、羌族要远得多。

与其爱搬迁的习俗相关的是，凉山彝族无山神、地盘神、家神等与“地”联结的信仰，至少是没有藏、羌族那种与地盘相联结的信仰。他们可以在空地上随便盖房子，甚至不愿在有人住过的老地基上盖房子。由于经常搬迁，彝族村落的房子结构简单，远不如藏族、羌族的房子那样坚固、精致而能供人们长期居住使用。

与他们爱搬迁、无惧于迁于远方的习俗相关的是，凉山彝族的家支记忆非常发达。在此方面，凉山彝族与其北方大渡河、岷江流域的藏、羌族有相当大的差别。相对于羌族、藏族之家族记忆浅短，甚至家族血缘记忆与地缘（房名）记忆相混，彝族的家支历史记忆十分发达。甚至于，为了记忆经常长达二、三十代的家支祖先之名，他们发展出便于记忆的父子连名制。在这样几十代的家支历史记忆中，有英雄及其事迹，有迁徙之空间记忆，有战争，这些都是羌族“弟兄祖先故事”历史记忆中缺乏的因素。嘉绒藏族之家族记忆中也缺乏这些因素。以下是一位彝族祭师所述的家支历史：

我们凉山彝族是古侯、曲涅两兄弟的子孙，其中很少一部分是统治者“诺伙”，黑彝贵族，大多数是被统治的白彝“区伙”。吉克是曲涅部落许许多多氏族中的白彝氏族，其中又分支为七个亚氏族，再分出许多小氏族。我们吉克氏族的先祖“吉克”是出生在四川凉山州美姑县境的龙头山脚

“吉鸠海玛”，即今美姑县甲谷区尔琪乡核马村。吉克生七子，即是有名的“龙头山下吉克七祖”。

吉克七祖除了杰贺杰牟两祖（即六房及七房）迁居云南昭通一带外，其余一至五房都留居美姑。⁸

由以上家支历史叙事可见，它仍有“弟兄祖先历史”的结构因素（如吉克七祖弟兄），但叙事中出现了这些弟兄的父亲，一位“英雄”，又有族群迁徙，此已具“英雄祖先历史”的雏形了。据这位彝族祭师称，这氏族成员所居村寨，“遍布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的雅砻江两侧与安宁河、普雄河流域的川西南广阔的彝区各县及云南省的部分县”⁹。

凉山彝族便是靠着家支记忆到处迁徙，到处可得到家支的奥援（无论在经济或武力上）。但也因家支组织与记忆，他们很容易卷入与家支有关的械斗恩怨中。最后，由于这些家支记忆，一个家支的人口与空间势力经常在扩张中。在羌、藏族村寨中，由于一地有房名的户数固定，以及因缺乏血缘亲族的历史记忆机制，“家族”几乎是不会扩张的。

五、结语：川西藏、羌族与川南彝族社会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川西的藏、羌族社会，由于人类的生存资源匮乏且散在一个个山沟中，因此每一山沟中皆形成严格的资源分配与分享体系。各家有各家的田地，寨子有本寨的草山（放牧之处）、林场（伐木之处），都与相邻人群之间界线分明。一层层有共同“祖源”（譬如弟兄祖先）的人群，如家庭、家族、寨子的人或一条沟的人，都是共享、区分与竞争共同资源的人群。山神信仰所反映并强化的，便是此种人类生态。小的、近的山神佑护一小族群（如一寨的人）的资源界线；大的、远的山神佑护广大土地间的人群资源。在此如此一层层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的山神信仰下，各地人群的关系也是既合作又有区分、对抗。弟兄祖先故事（历史）中的“弟兄”隐喻的也是这样的人群关系——弟兄为同胞所以是合作的；亲兄弟明算账，所以是有区分的；兄弟经常相争所以又是敌对的。因此，无论是山神信仰或是本地的“弟兄祖先故事”，它们所表达的意义皆同。

这种社会的普遍特色是，在日常生活中各个居处相近的村寨人群，大家共同保护本地资源，也彼此区分地盘与争夺资源。因此，他们十分注重人群与资源空间的关系。在这样的人类生态下，产生的文化表征便是地盘神、山神等保护“本地人地盘”的神灵信仰发达，村寨内外小地名十分丰富。还有便是，不能随便盖房子，房子要盖在老地基上，因只有老地基才有地盘神。由于迁到一地盘上就要接受该地的家神，成为该房名下的人，因此同一房名之人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其“家族”认同中重空间关系、轻血缘关系。他们的家族历史记忆非常短，约只有二至三代，而且经常以十分简单的“弟兄祖先故事”模式化历史来表述。总之，这是各人群谨守自身地盘，与邻近人群划分地盘，并大家彼此尊重地盘边界的社群——各地山神便是各地盘及其边界的守护神。在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大家尊重彼此的地盘界线。不轻易越界打猎与搬迁。在资源极端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以对内争夺（而非对外征服）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

⁸ 吉克·尔达·则伙口述，吉克·则伙·史伙记录，《我在鬼神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正文，页3。

⁹ 同前。

与川西羌族、藏族社会有截然差异的是过去（指1950年代以前）的凉山彝族社会。这种差别的根本是人类生态。相对于藏、羌族的对内共有、区分和竞争生存资源的人类生态，彝族是以对内阶序化分配、对外迁徙扩张，来解决生存资源匮乏的人类生态。为了迁徙以寻求新的生活空间，彝族有发达的家支组织与相关历史记忆（以及父子连名这样的记忆工具）。这样的家支历史记忆，经常让一家家庭即使迁于远方，亦能到处得到家支的奥援。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对于“地”并无留恋；那里好便往那里去。另外，他们的历史记忆中虽有“弟兄祖先”因素，但这些“弟兄祖先”都是某一“英雄祖先”的儿子——这已是另一种历史性，“英雄祖先历史性”下的“历史”了。

川西的羌、藏族与凉山彝族可代表青藏高原东缘两种人类社会类型：我们可以“山神社会”与“英雄祖先社会”来为之命名。由于山神社会在青藏高原东缘非常普遍，我们也可将彝族重家支英雄祖先记忆的社会当作本地一异例。山神社会是注重“地缘”的社会，或者说他们社会中的“地缘”认同影响其“血缘”认同。因同一房名下的家族也是共祭一地盘神的人群，所以住处相近的人们也是“血缘”关系亲近的人。山神信仰所表现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也一样，强调的是在同一地盘上共享并彼此竞争资源的人群认同。彝族的“英雄祖先社会”是重“血缘”认同的社会，家支历史记忆是联系此血缘群体认同的工具。与注重地缘的藏、羌族社会相比较，彝族家支历史记忆与家支组织的意义更能显现：它们让个人及家庭能脱离本乡本土的束缚，到外地、远方寻求新资源，而借着“血缘”记忆与因此产生的家支情感得到远近家支人群的支持与帮助。

这两种社会的特色及它们间的区别，似乎也暗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以及“历史”在其间所扮角色。简单地说，我认为“弟兄祖先历史性”是一种流行在平等自主（egalitarian）社会中的历史记忆文化，如此产生之历史记忆，强化的是小范围、内部较平等的、内向式解决资源匮乏问题的人类生态体系与相关的人群认同。这可能是最早的人类生态模式，或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较普遍的一种人类生态，与之相应的则是“弟兄祖先历史”这样的历史记忆模式，以及血缘与地缘混合的族群认同。彝族的家支历史记忆、内部的种姓阶序社会以及其族群迁徙、扩张的历史，则代表一种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上晚于前者的人类生态。与此人类生态相应的是记载人群血缘关系的“历史”，以及血缘与地缘分离的家族组织。此或许显示，血缘族群与相关历史记忆最早的功用在于让人们可以脱离“乡土”而向外寻求及扩张领域资源。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弟兄祖先历史”，以及血缘与地缘混合的族群认同，可能是人类最初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模式。世界许多地方可能都曾经历由“山神社会”朝向“英雄祖先社会”发展的过程，血缘性族群认同与“英雄祖先历史”记忆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让人类可以聚成大群体但不用住在一起，而散为许多小群体来四处扩张族群资源领域。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假说；我们需要许多的研究来印证、修正或否定这样的假说。

附件一 “山神社会”与“英雄祖先社会”之比较

川西羌、藏族	凉山彝族
平等社会。	阶序社会。
有山神信仰，有地盘神与家神信仰。	缺乏山神信仰、地盘神与家神信仰。
注重各人群的地盘界线。在自身领域内打猎、挖药。	不太注重地盘界线。打猎、挖药的范围很远。
以对内分配、争夺来解决生活资源问题，不轻易迁离村寨。	以对外迁徙、扩张来解决生活资源问题，因此对于搬迁较随意。
家族祖源记忆缺乏，也缺乏英雄与战争、迁徙记忆。	家族祖源记忆十分丰富，且有英雄、战争与迁徙记忆。
村寨内外小地名丰富。不能随便盖房子，房子要盖在老地基上。	村寨内外地名较少。可在空地盖房子，甚至不愿在旧地基上盖房子。
重空间人群关系的族群认同；跟着地方划圈圈的亲戚关系。	重血缘人群关系的族群认同；家支人群认同重于同乡（空间）认同。